



他20多年自费搜集整理 出版130万字《重庆方言辞典》

从农民到方言学者,巴南区木洞镇的李元烈因太执着被称为“疯子”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陈显涪



第一次见到李元烈,我简直不敢相信,他就是那个“重庆方言大王”。不高的个子,满是皱纹沧桑的脸庞,音容笑貌都无特别之处。可他那双眼睛深处,却浸润着一种少有的深邃,里面包含了很多的艰辛和探索。

重庆方言有什么特别的意义,值得他花几十万元去“抢救”?他说,不是抢救,是搜集整理成辞典,传承后人。“当然,这里也有抢救的意义,因为年轻一点的人,很多都不会说太多的重庆方言了。”

被人误解为“疯子”

重庆方言,是汉语官话分支西南官话的一种,和四川话有90%的相似之处。狭义的重庆方言,指重庆中心城区使用的方言,广义则指重庆市各区县使用的方言。

重庆话的特点是直白易懂,方言词汇很多,诙谐幽默。目前,使用传统重庆话的大多是50岁以上的老重庆人,传统重庆话正面临消失的危险。此外,传统重庆话的特有短语被书面词语所替代,许多年轻的重庆人已不能理解。因此,研究和保护重庆方言,对于传承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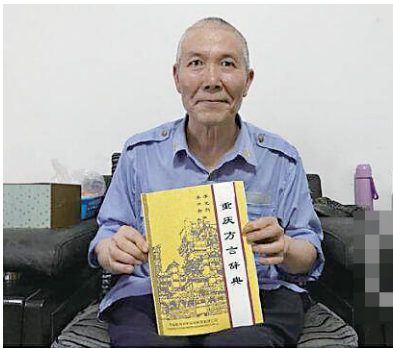
李元烈是重庆木洞人,农民出身,父亲上过私塾,他受父亲影响很大,从小就喜欢文字。后来,他成了当地的文化专干,一直干到退休。李元烈只上过职高的花卉专业,其他的知识全靠自学。他学习上的执着,与平常人不太一样。譬如看一本书,常常会忘记吃饭睡觉,所以研究重庆方言时总是废寝忘食,被人误解为“疯子”。当然这里的“疯子”也有褒扬的意思,意思是说他学习很拼命,有点不食人间烟火。1985年,他以一个农民娃的身份考上了巴南区仰山乡的文化专干,后来自学完成汉语言文学的本科。由于工作努力肯干,深得上级和群众好评,199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说,他想在有生之年做出一些成绩,“《重庆方言辞典》的编写,搜集难,整理难,走访难,出版更难。”他说,他抱着几百万字的书稿,跑了多家出版社,人家都不出版方言辞典,最后由中国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本厚厚的书,真的难上加难。

从某种程度上讲,方言的界定已不单是语言学层面的问题,更代表着地区文化特色,是一种社会现象。李元烈收录、书写了215万字的手稿,出版的这本《重庆方言辞典》,让重庆方言文化的羽翼更加丰满。

乡音何处有?

提到重庆方言,想必本地人都能口

方言大王
李元烈



李元烈与他的《重庆方言辞典》

角生风,随便说上十几二十个。不过,即使是在重庆这一方土地,不同地区、不同年纪的人群,说的重庆方言也是五花八门。通常,越是长者知道的方言越多;越是偏离中心城区的地区,方言的差异化则越重。所以,重庆话单一个“耍”字的快意,要胜过多少“玩”字的随性;“惨”字的穿透力和表现力,又强于多少文字的修饰;“巴适”“忼势”“雄起”“打望”“崽儿”等词语,都方方面面地刻画着血气方刚的重庆人。

然而,重庆方言正在悄然流逝。小孩从进入学校念书起,就被要求在课堂上使用普通话回答问题。回到家之后,年轻的父母开始尽量用普通话跟孩子对话,尽管那些普通话中带了一丝“川普”的味道,但许多方言就渐渐消失了。在更老一点的地区,有些古稀老人才会说出一些原汁原味的重庆土话,面对这些妙趣横生的词语,年青一代大都一脸茫然。

有人说:“语言的精髓在于传承。”经历了多年的打磨,重庆方言已然塑造出了明了、直率、简洁的特点。方言本身多以口语传播,但为什么要这样读,为什么要如此发音,其中大有讲究。李元烈,算是一个悟透了重庆方言的本地人。

2015年,深耕基层文化工作的李元烈已经步入到退休的年纪,他萌生了将重庆的方言、俗语、歇后语、集结成册的想法,并且决定以辞典的方式收录,注音、释义,让它们永远流传下去。这一想法当然离不开李元烈的过往经历。过去的二十多年间,李元烈在巴南区木洞镇上山下乡,走村串户。因为工作,

他常与老百姓打交道,经常会接触到民间俗语。大概是年幼时父亲的言传身教,或者又因自己求学时选择的汉语言文学专业,这让李元烈在工作之初就对巴渝民间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于是,他走遍巴渝山水,探访无数朋友、学者和普通百姓,用尽半生心血出了一部《重庆方言辞典》。

学无止境,从无到有

2020年4月,李元烈的《重庆方言辞典》横空出世,全书816页,包含30000余条重庆民间方言词条,共计130多万字。实际上,在李元烈最初编撰的草稿阶段,这本方言辞典累计的字数多达215万字,林林总总的素材草稿加在一起重达27公斤,已经远远超过这本出版的辞典的重量。

在浩如烟海的纸张中,还穿插着一些破旧不堪的烟盒纸,每一张烟盒纸的背后都记录着一两个重庆的“言子儿”。在烟盒纸上速记、打欠条、写电话、地址等行为,均是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这一特定群体的集体记忆。那时候,物质条件有限,李元烈工作时常会记录当地村民的情况,在大家交谈时,难免会有几句方言。俗话说,好记性不如烂笔头,每当李元烈听到陌生的“言子儿”,他会习惯性地做出一系列的动作:把一个烟盒拆开,掸掸上面的烟沫子,然后翻过带图的一面铺在桌子上,开始记录。就这样,李元烈所记录的方言从无到有,从优到精,一边记录一边翻阅书籍求证,翰墨耕耘,才有了如今的积累。

李元烈有此般的毅力,可以说是从小就饱受父亲思想的影响。父亲曾经亲历10年的私塾教育,对自己6个子女的教育更是亲力亲为。在年幼时期,李元烈的清晨永远都是伴随着读书声,而到了夜晚,几个兄弟之间还会在煤油灯下读书习字。正是因为父亲的严苛,让李元烈及兄弟提早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,此后学习这件事情就没有被他落下过。当高考恢复之际,李元烈和兄弟几人都各自从小镇上脱颖而出,顺利地考上大学本科或大专。值得一提的是,当时李元烈虽然只是在西南师范学院主修汉语言文学专业(大专),但到了后来人们常说的知天命的年纪,他还通过学习和考试,又拿到了一份教育管理专业的本科学历。

正如李元烈自己说的那样:“我一直在学习,学无止境。”如今,李元烈已经六十有余,本该是退休享福的年纪,却开始学习使用电脑。没有学过拼音,就用笔画输入法。在他心里,任何困难都可以通过学习得到有效的解决方法。更何况,退休后终于有时间完成自己积蓄



多年的心愿,方言辞典的事业必须快马加鞭,即日启程。

一个字的锱铢必较

在李元烈的回忆里,筹备方言辞典的那段时间,至少有3个月是忙得不可开交,除了吃饭睡觉,一天中有足足16小时花费在电脑查阅资料、编撰文字上。一时间,就连镇上的乡亲邻里都以为他凭空消失了。

60岁其实已经可以被称作老年人,可他却有年轻人般的干劲。不过,中间的曲折只有他自己知道。由于方言没有标准字为示范,多以口音发声为主,即使是重庆方言中偏日常的“leng ge”“sa zi”等词语均有不同版本,作为本地人也极有可能写不出方言中的文字。例如:重庆人对“蹲”称为“gu”,而这个字的写法没有统一的标准。为此,李元烈还与回家探望的儿子在字面上针锋相对,两人互不相让,到最后儿子就说:“这个字,你说是就是吗?凭什么?”

也正是经过此番争论之后,李元烈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编纂辞典时,必须在逐字逐句上做到有理有据。为了分别出一个字的差别,李元烈可能会花上几天的工夫去求证,如果没有得到求证,他誓不罢休。最后,“gu”字终于让李元烈在典籍中查阅到,在《戏曲剧本选集》中:“手扒栏杆过桥嘴,但见乌鸦跼几堆。”在《集韵》中:“跼,空胡切,蹲貌。”如此一来,重庆方言中“跼”这一说法才被正本溯源。

除此之外,经过李元烈细心考证,重庆方言的部分汉字读音比普通话更接近中古汉语,有不少还是古代汉语的延续,在中国四大名著、唐诗宋词中都能找到一些影子。比如:“臊皮”“腌臢”出自《红楼梦》,“打眼”源于《西游记》,“将息”一词则出自宋代著名词人李清照的《声声慢》。李元烈认为,对于方言应该“进行批判性继承”,取其精华,去其糟粕,让老祖宗留下的方言一代一代传承下去。至于什么是批判性继承,在《重庆方言辞典》中自会寻找到答案。

李元烈经常自嘲道:“倘若不是一个‘疯子’,谁会用二三十年时间做这样一件事情?”但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“疯子”,重庆方言这一民间文化瑰宝才得以留存下来。

李元烈说,他现在的重心是构思下一部重庆方言辞典,“还有20000多条没有发表,还需进一步整理、校对、完善,我要抓紧时间,争取写好第二部《重庆方言辞典》。”

(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)